

当代 1988—1990

浙江文学概观

DANGDAI ZHE JIANG

WENXUE GAIGUAN 郭志今主编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
当代浙江文学概观

1988—1990

郭志今 主编

厦门大学出版社

【闽】新登字09号

当代浙江文学概观

(1988~1990年卷)

郭志今 主编

*

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良渚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7印张 200 000字

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615-0652-X/I·43

定价：5元

目 录

平稳发展 硕果丰厚(代前言)

——1988—1990年浙江文学扫描 (1)

概 观 篇

春潮涌动的长篇小说 (11)

孕育新机的中篇小说 (26)

别开生面的短篇小说 (42)

走向全国的诗歌 (55)

群星璀灿的散文 (67)

快速反映时代的报告文学 (82)

严峻审视现实的杂文 (92)

锐意探索的理论与批评 (105)

作 家 论

悲剧眼光·恐惧感·抽象形式

——余华小说读解 (121)

张廷竹小说论 (133)

禁锢与超越

——评胡尹强的小说创作 (145)

寻找迷失的梦

——评夏真、王毅的小说创作 (157)

沈虎根创作述评 (169)

评蒋焕荪的小说创作 (183)

人格化的诗意世界

——论龙彼德的诗 (193)

资 料 篇

长篇小说要目 (209)

中篇小说要目 (210)

短篇小说要目 (213)

诗集要目 (220)

散文集要目 (221)

杂文集要目 (222)

后 记 (223)

平稳发展 硕果丰厚(代前言)

——1988—1990年浙江文学扫描

今 古

本书所描述的是1988—1990年间浙江文学发展状况。

这三年,曾被视为我国文学的“低谷时期”。从现象看,这话也许不无道理。确实,这期间的文学创作,既无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的“伤痕文学”和“反思文学”那样的热情、轰动,也不象八十年代中期那么花样翻新、热闹非凡,而显得有点冷清寂静,缺少“轰动效应”。然而,在我们看来,这却是正常现象。从根本上说,衡量文学的发展,是不能以“轰动效应”“花样翻新”为标志的。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某些作品的“轰动”后面,其实有某些非文学的因素在起作用;而八十年代中期创作和批评理论上的流派迭出、花样翻新,则反映了文学变革的要求,是文学突破传统模式的粗浅尝试。这些,都只能说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小插曲,不能以此来判定文学发展水平。当然,也应当清醒地看到,这时期的文坛,相对而言,确是比较消沉的,不仅理论批评不象以前那样活跃,创作也较少探索精神。这情形相当复杂,有文学本身的原因,也有非文学的原因,这里不作讨论。但是,用“低谷”来评估这三年的文学发展状况,显然不那么恰当。事实上,这期间的文学还是有很大的发展,不过那是沉稳的发展,是在转型、调整中的发展,这样的发展意味着我国当代文

学不断地走向成熟。这情形，在浙江文学的发展中显得甚为突出。

1988—1990年期间，浙江的文学与全国文学的发展大致保持了同步。这三年，浙江的文学创作，尽管处于调整之中，但仍然呈现了较强的发展势头。无论是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杂文、报告文学，抑或影视、戏剧文学等，都有较好的成绩，不仅数量可观，质量也有所提高，有的堪称上乘。下面便是这三年的创作实绩。

一、平稳发展的小说。这三年浙江的小说创作，从总体看，是继续探索、平稳发展的时期。虽然处于调整之中，但多数作家并没有中止其艺术追求。他们不断调整创作心态，注意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，不断探索新的艺术途径，使创作日趋成熟。同时，这期间，还涌现了一批较为年轻的作者，以其艺术观念新，艺术起点高，一开始走上文坛，便不同凡响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所以，这三年的小说创作，无论是数量或质量，也无论是长篇、中篇或短篇，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，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开拓、突破。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

其一，是长篇小说获得大丰收。新时期以来，我省的长篇小说创作，比起中短篇小说来，其发展较为缓慢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79—1981年为4部，1982—1983年为5部，1984—1985年为5部，1986—1987年为6部，而在1988—1990年三年之中，则一跃而上升至15部以上，几近于前十年的总和。这是一个大丰收！而且在艺术质量上，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：首先，大多数作品现实感较强。许多作品的题材和主题都来自现实生活，有的还直接取材于当前社会生活的热点，即使是写历史题材，也立足于现实，用现实的眼光来观照、开掘，融注现实精神于作品，力求达到历史与现实的沟通、统一。其次是注重从人性的深度揭示人物的复杂性，开掘深层的文化内涵，而不停留于故事情节的表层描绘，使作品富有历史纵深感。再次是在艺术上有所创新。大多数作品采取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，但在保持现实主义基本特征的前

前提下，大胆吸取了某些现代主义表现手法，如叙述角度的灵活多变，时空构筑的跳跃交错，某些意识流手法的运用，等等，使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异彩纷呈，一新耳目。当然，从更高的要求看，这时期的长篇小说，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：有的生活容量不够丰满，情节比较单纯，近乎中篇的拉长，缺乏长篇应有的开阔、丰富；有的对外来表现手法的运用比较生硬，不够圆熟，等等。

其二是中短篇小说有了新的拓展。新时期以来，我省的中短篇小说，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是令人瞩目的，尤其是中篇小说一度在浙江文坛简直有独领风骚之势。在那些有全国影响的作品中，也以中篇居多。而在1988—1990年中，中篇小说的创作仍然居于榜首。总的说，这期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有较大的进展，其中最显著的是：首先，作家们在自觉发挥各自艺术个性的同时，努力追踪新潮流，调整旧心态，探寻创作新途径，从而使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，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。其次，题材有了开拓。作家们在关注对于乡土风情抒写的同时，努力开掘地域文化生态，揭示深层的文化底蕴。三年中，这方面的创作成果最为丰厚。这在短篇小说中表现尤为突出。可以说，这三年的短篇小说中，最受欢迎的篇什，大多是那些抒写乡土风情和地域文化的作品。这些作品，或醉心于民俗风情的展示，或致力于民间遗闻佚事的叙述，或侧重于吴越地域人格精神和历史文化的心理积淀，千姿百态，意蕴无穷。同时，又以现代意识予以观照，赋予历史文化以现代意义，努力发掘其积极向上精神，使历史文化得以新的升华。这是这类作品的魅力所在。

二、旺盛不衰的诗歌。浙江是文化之邦，诗歌之乡，历代诗人辈出。新时期以来，虽未出现饮誉全国的大诗人，但其创作势头，一直旺盛不衰，富有创新精神。尤其那些年轻一代的先锋诗人，在全国诗坛，也称得上名列前茅，不可等闲视之。1988—

1990年间，我省诗坛虽然与其他创作领域一样，逐渐趋向平稳、沉静，但仍然显示了较强的创作实力，成绩斐然。三年中，出版了诗集16部，诗论2部，为前所未有的。同时，还涌现了一大批新的青年诗人，人数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。尤其令人可喜的是，这批新诗人大多艺术起点高，初登诗坛，便出手不凡，显示了较强的创作实力，为诗界所重视。可以预期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，浙江的诗歌创作在全国诗坛都将占一席之地。

三、生机盎然的散文。新时期以来，一度冷落的散文日渐复兴，且成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文体。许多报刊竞相开辟专栏，提供园地，使散文创作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。1988—1990年三年，是建国以来我省散文创作的高峰期，不仅专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对此情有独钟，不少小说家、诗人也常涉足，乐此不疲。这期间，不少作家出版了散文集子，还有一些作家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篇什，为结集出版作了准备。至于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散文作品，更是不胜枚举。其中有不少作品在全国各项评奖中榜上有名，有的作家还连连中式，屡获大奖。这些，都显示了我省散文创作的实力。综观这一时期的散文，不仅数量可观，而且颇具创意，每每给人以新鲜之感。其表现，首先在于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。许多散文，都以表现作家独特的思想感情为宗旨，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。即使是那些描写自然景物的游记散文，也不求客观逼真，而以抒写作者性灵为尚，或托物寄兴，或借景抒情，表现浓厚的主观色彩。尤其那些所谓情绪化的散文，则往往直接抒写作家自己一时一地的瞬间感受和情绪的微妙变化。其次，是对生活化的追求。许多记叙散文，突破了过去那种着意大题材、大人物的传统模式，而把目光转向凡人凡事，或追踪生活的流动，或从中发现人生哲理，使作品更加贴近生活，更富人情味。再次，是表现手法新颖多样。许多散文作家，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某些现代派表现手法于散文创作，如“蒙太奇”、意识流等手法，使

作品多姿多彩，风格迥异：有的以全新的题材取胜，有的以现代与传统相结合而引人注目；有的追求生活原色，看似琐碎零乱，实则生活气息浓厚，韵味无穷；有的主题多义，看似晦涩、模糊，实则内涵丰富，意蕴深沉；有的结构随意，行文漫不经心，实则本色自然，恰似生活的自然流动。如此等等，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作品，题材过于狭小、琐碎，作者的兴味只在于身边琐事和个人的悲欢，缺乏应有的社会意义和深沉意蕴。

四、蓬勃发展的报告文学。新时期以来，报告文学一直是热点。我省的报告文学创作，也异常活跃，并产生了一些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作品。1988—1990年间，尽管整个文学创作相对平稳，而报告文学却依然十分活跃，热潮迭起，其数量之多，简直难于统计。综观这时期的报告文学，总的说，依然保持着贴近生活、正视人生、快速反映的优势，而题材有新的开拓，生活视野更为开阔，风格更加多样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，首先是描写重点的变化。以前的报告文学，往往把重点放在描写人物方面，这时期的报告文学，则对生活作“全景式”的宏观扫描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，多侧面、多层次、全方位地反映改革大潮；其次是作家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有所加强。他们忠于事实，敢于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，既肯定、歌颂改革中的英雄业绩，也反映改革中的困难乃至某些负效应；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社会热点问题，能进行深层的理性思考，发表自己的见解。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的描写中，每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，表现了作者对改革事业的热忱关注和时代责任感。这些，可说是本时期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，也是它的优点。然而，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，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：“报告有余，文学不足”，缺乏艺术上的追求。少数作品，甚至有单纯商业化倾向。尤其一些靠资助而写作、发表的作品，带有浓厚的广告味，更谈不上什么

艺术追求。自然，这是商品经济大潮对文学的冲击，是作家、刊物谋求生存的挣扎，很难苛责。也许对作家来说，写作这样的作品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五、走向繁荣的杂文。浙江的杂文创作，一向较为发达。五十年代以后的一个时期，虽然时起时落，但其成绩仍不容忽视。新时期以来，随着思想的解放，杂文创作更呈现出勃勃生机。1986—1990年期间，在全国杂文创作相对冷落之时，浙江杂文界仍较活跃，创作的积极性持续高涨，后劲甚大。这期间，还涌现了一批杂文新秀，给浙江的杂文发展带来了新的风貌。五年中，浙江杂文作者除了在本省各种报刊杂志外，还不时在中央报刊或全国有影响的大报、晚报和杂志上发表杂文作品，如《人民日报》及其海外版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等报刊，就经常出现了浙江杂文作者的名字。其中不少作品还被选入全国性的杂文选集（如《全国青年杂文选》、《人民日报杂文选》等）。此外，还编辑了《浙江杂文选》（柳琪编），出版了个人杂文集《风雨四十年》（魏桥著）。如果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看，则这五年的浙江杂文创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：大多数杂文作者都是为时而作、有感而发。他们密切关注现实，干预时政，思想深刻，情真意切，表现了极强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。尤其那些政论性杂文和时评性杂文，颇能反映浙江杂文的战斗传统和作者的忧患意识。而在艺术上，这期间的杂文也有长足进展，表现手法更趋多样，技巧更为圆熟。有的作者还对杂文体式进行新的探索、尝试，并有一定成效。自然，从另一方面看，这五年的杂文似乎过于理性化一点，以致使人觉得冷静有余，热情不足，虽深刻而少泼辣，虽严肃而少情趣。

六、锐意进取的文学理论与批评。新时期以来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，我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直较为活跃，新潮迭

出，论争热烈。相比之下，浙江的理论批评界比较沉默，显得老成持重，谨慎有余，锐气不足。但从1985年前后开始，逐渐有所改观。1986—1990年间，更有较大发展。这期间，理论批评相当活跃，成绩也很可观。五年中，出版了理论批评专著二十多部，发表论文数百篇，影响遍及全国，其成绩不亚于同时期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文类。其中，最可注意的有两点：第一，紧紧追踪时代文学思潮的变化。1985年以后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外文学理论的引进，我国的文学观念开始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，我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也出现了新局面，从内容到方法都有重大的革新：研究内容多指向、多视角、多层次，研究方法多极化，举凡各种文艺新学科、新方法和文学创作的不同流派，都在研究和评论的视野之内。第二，结合实际，深入研究马列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。面对着各种文学思潮的冲击、挑战，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。对此，我省理论批评界做了大量工作，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或专著：或联系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实际，阐发马列文论的基本原则，或以马列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为指导，评析当前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动向，或探讨如何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问题，或系统研究毛泽东、邓小平文艺思想，等等。这些都表明，这五年中我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，已有很大的改观，其成就是不容忽视的。

回顾1988—1990年间我省文学发展状况，总的说来，是令人快慰的。我们的作家、理论批评家大胆探索，潜心创造，为繁荣我省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，他们的业绩是应当载入史册、永志不忘的。我们相信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，我们的文学事业必将更加繁荣昌盛。

概 观 篇



春潮涌动的长篇小说

盛 钟 健

比之前几年的文学创作，1988—1990年度的浙江长篇小说有明显的突破。这可以先用省作家协会所作的不完全统计数字加以说明。据统计，本省作家已出版的长篇小说（不包括通俗类型的）：1982—1983年为2部，1984—1985年为5部，1986—1987年为6部，而1988—1990年3年之内至少发表出版了15部以上。除了数量上增加以外，后面3年作品的总体质量也确有长足的进步。鉴于这个现状，我们有理由把1988—1990年看作是我省长篇小说春潮涌动的高涨时期。

这一阶段的长篇小说中，最能引起读者注目的是那些以写知识分子命运为主要内容的作品，包括冀访的《故园风雨》、胡尹强的《情人们和朋友们》和沈贻炜的《荒烟》。这些小说的作者对描写对象有过长期的观察了解，他们把目光放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审视上，作品通过环境、事件和性格的细致描述，发掘出蕴含其中的社会意义。作家之间的不同经历和经验，又使他们各自的作品，呈现出不同的感情基调和叙事风格。

《故园风雨》写的是80年代初期，印尼籍华人女子田彩来中国大陆寻找失散多年的大哥田杉，以及兄妹相见后的种种情形。小说题目脱胎于鲁迅诗句，用来说明祖国的风风雨雨，决定了游

子归来的遭际命运。田杉从小生长在印度尼西亚，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，他满怀激情从印尼回国参加抗日斗争，抗战胜利后他又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。谁知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的革命的青年，解放后却被错划成右派分子，以后又莫名其妙地以“里通外国”的特务嫌疑罪名被判刑劳改，一下子沉沦20余年，身心受到极大摧残，他和国外亲人也从此中止往来，音书断绝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田杉得到改正平反，可是有关政策仍迟迟不能落实，经过来华的田彩和其他人多方努力，情况逐步好转，生活条件开始改善，可是这时候的田杉已经身患绝症，无法再为他心爱的祖国继续工作了。当初年青有为的田杉，就在冤屈和清贫中间，白白地消耗了他的一生，这是谁的过失呢？小说里说：“过去的都过去了。过去的恩恩怨怨，当然不是哪个人应该负责的。”田杉的坎坷遭际实际上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，而它又是和整个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进程密切相连的。在过去政治上“左”的路线的干扰下，比田杉晚一辈的青年知识分子同样逃脱不了风风雨雨的打击。胡尹强《情人们和朋友们》里面一群60年代大学毕业生，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头上就笼罩着政治运动的阴霾，随着阴霾的越聚越浓，他们越发感到惶惶不安。主人公钟兆斌和女友姚蔚冰之间的爱情，因为姚蔚冰的出身不好和钟兆斌的思想右倾，备受政治压力，不得不从起初的热恋到后来的疏淡，最后只好痛苦地分手，各自另组家庭。接二连三的人为的灾祸，把云县中学几个坦直、求实、有正义感、有上进心的青年教师弄得晕头转向，他们栖身的东岳宫宿舍真正变成了承受苦难的地狱，情人之间朋友之间在外力的压挤下，发生了新的离析和组合。

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来反映生活，作品讲究细节和性格的刻画，在铺叙环境氛围上，力求再现当时情状，给人以真实感。《故园风雨》写抗战时重庆的乌烟瘴气，解放前南京和上海各大学内部的复杂斗争，符合历史实际。田彩从雅加